

# 智利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參訪報告

黃默

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

劉恆君

東吳大學政治系博士班研究生

張家維

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研究生

蔡旭東

東吳大學政治系博士班研究生

朱家瑛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 摘要

本文為智利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的參訪報告。這次的研討會於 2016 年 12 月 12 日至 15 日於智利大學舉行。東吳大學一行六人參與了這次會議，並發表論文或研究海報。本文由參訪的成員分別就不同的面向寫成，包括劉恆君同學介紹此次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的發起背景、張家維同學報告智利的政治發展與轉型正義、蔡旭東同學報告智利的高等教育概況、朱家瑛同學報告智利在後威權時期藝術與文化的發展，我則簡短地分享了此次參與會議的觀察心得。

## 關鍵字

智利、人權教育

---

## 壹、前言：智利會議簡介（黃默）

2016年智利之行是應邀參加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第七屆年會，年會主辦單位為智利大學法學院（University of Chile）。該次會議為期四天，從12月12日至12月15日，參加的成員包括東吳大學人權學程李河清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黃默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劉恆君與蔡旭東、碩士研究生張家維以及人權研究所朱家瑢六人。籌備時期，東吳大學政治學系黃秀端教授也答應同行，但後來另有要務，只能放棄參與。本文我只就此次智利會議稍作介紹，若干會議細節請見其他成員的報告。

根據智利大學法學院的規劃，研討會的活動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在法學院內部的討論、文章發表與海報發表。會議主題包括「轉型正義」、「人權教育」、「多元化與性別人權」與「公民權倡議」等。訪問團成員中有三位發表文章，分別為李河清教授〈台灣的永續發展、氣候變遷與人權教育〉（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aiwan）、我的文章〈台灣轉型正義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以及張家維同學〈從智利轉型正義看台灣轉型正義與民主鞏固〉（Observing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f Taiwan through Chile's Experienc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另外三位同學被邀請以海報形式發表她／他們的研究成果，分別是劉恆君同學〈台北市公共住宅政策〉（Public Housing Policy in Taipei City）、蔡旭東同學〈中國經驗與轉型正義〉（Ideal Typ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Chinese Experiences）與朱家瑢同學〈台灣警界性別歧視個案研究〉（A Case Study o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Police Force in Taiwan）。論文場次討論十分地熱絡，尤其有關拉丁美洲轉型正義，多位主講人仗義執言，引起不少的共鳴，但海報發表的場次較為冷淡，並沒有引起多少注意，這可能是宣傳不足所致，也可能是法學院學生都忙於功課，對國際事務並不那般關心。

另外一部分是參訪，包括「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以及一個過去的刑求中心（Villa Grimaldi: Museo de Sitio Parque por la Paz）。這個記憶與人權博物館成立於2010年，是為紀念1973年皮諾契政變以後17年獨裁政治時期人權

受難者，也為推廣人權教育。在我們訪問了博物館以後，博物館館長與大家座談，我也應邀發言，簡單說明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歷年來與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的互動與聯繫，並表達今後進一步合作的意願。參訪刑求中心的過程，大家心情十分沈重，當年的受難者被逮捕或綁架，再移送至此，歷經拷問與刑求，或判長期監禁，或判死刑，現場歷歷在目。

為了進一步瞭解民間社會的活動，我們拜會了智利國際特赦組織分會，與執行長及一位年輕志工會談。以我們的了解，智利國際特赦組織設立於皮諾契17年獨裁政治以後，還在草創時期，只有在聖地牙哥設有總部，在其他智利城市並沒有分部。活動也不算多，以兩位志工的工作來看，她們最關心的議題是婦女權益，以各種的宣傳來提醒女性意識與女性地位。

再以參與的學者專家而言，根據統計約有240人，大多數來自智利及鄰近國家，民間團體不在少數，尤其是來自於哥倫比亞與智利南部原住民族（Mapuche）的代表，為他們族群所受到的迫害大聲疾呼，十分引起共鳴。歐美與會者不多；在亞洲方面，台灣的團隊算是第二大團。這裏還有一個插曲，那是當我們抵達聖地牙哥之後，才發現有另外一個台灣團隊，約10名，經過交談以後得知，他們是「世界公民總會」與「良心教育組織」的成員。這兩個組織都與太極門氣功關係密切，在若干論文場次，他們也十分勤於發問，偶爾也會提到台灣政府壓迫太極門的事件，尋求國際的重視。他們雖然說來自台灣，但大部分是從台灣到美國、紐西蘭、澳洲的移民，多為研究生或國、中小學老師，個人的背景與訓練都算十分優秀，但對台灣瞭解不多。

在會議最後一日，加拿大平權會（Equitas）簡要介紹他們將在2017年於蒙特婁主辦第八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Equitas的創辦與加拿大最有名的人權鬥士John P. Humphrey教授密切相關，是為了傳承Humphrey的理念與功業。以加拿大的資源以及開放的社會風氣，第八屆的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必定有成。

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已經辦了七屆（歷屆情況參見下文第二節），成果明確可見，一方面是促進了國際間人權學術界與實務界的交流與互動，既有助於學術的研究，也有助於運動上的相互支持與合作。在參訪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

館時，有一部分的展出是在皮諾契獨裁時期，外國人權團體、工會等為了支持智利境內的抗爭活動所做出的海報，對智利受壓迫的人民起了不少鼓舞作用。我十分期待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能從交流轉化為一個行動的力量，對世界各國侵犯人權的事件，發出譴責與呼籲，來嚇阻對人權的迫害。然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大家同心協力才能達成。一方面需要一個決策小組來觀察、蒐集人權迫害事件的發展、聯繫各國的夥伴即時發出譴責與聲明；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個小型的募資基金，來支持這些工作的進行。

## 貳、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的緣起與發展（劉恆君）

### 一、會議緣起

這一次智利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源自 2010 年在澳洲西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舉辦的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創辦人 Sev Ozdowski 教授是波蘭的移民，他到澳洲任教以後，關注多元文化與移民的問題，在 2010 年籌辦第一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並規劃此後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由全球各洲輪流舉辦。迄今已經有七屆，下年度第八屆會議預定在加拿大召開。Ozdowski 教授暨是西雪梨大學「平等與多元學系」（Equity and Diversity Department）系主任，也擔任澳洲人權教育協會的主席。

本文側重於介紹 2012 年波蘭、2013 年台北、2015 年荷蘭與 2016 年智利舉辦的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第一屆與第二屆強調的主題都涉及跨文化的對話與多元文化的議題，與澳洲、南非的社會狀況和處境息息相關，而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則在第三屆以後才開始積極參與。2012 年初，Ozdowski 教授給東吳大學黃默教授與立法委員尤美女來了一封信，邀請我們主辦第四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經過幾度商量，並獲得當時將就任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教授的支持，評估我們過去屢次辦理大型國際會議的經驗與能力，如能獲得經費上的補助，必能承擔這項工作，況且這項工作對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也必然有所幫助。於是，我們答應承辦第四屆國際人權教育研討會。過了幾個月，我們接到第三屆研討會主辦單位波蘭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來信，邀請我們參加。我們依循傳統，每次國際會議都在可能範圍內盡量鼓勵同學參加，那次克拉科夫（Krakow）會議，黃秀端教授、黃默教授、政治系

劉恆君同學、人權研究所陳博文同學、鄧珮宜同學與李秀真小姐、薛維菽同學、黃曼婷同學、蕭翔鈞同學一行九人同去參與。

## 二、歷年發展

### （一）2012 年波蘭會議

亞捷隆大學位於波蘭克拉科夫城，是一所有名的天主教大學，在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克拉科夫城僥倖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古風猶存。該城深受教會的影響，依我們得到的訊息，克拉科夫城的決策若非獲得當地主教的同意，將會難以推動。該次會議主題為「如何在轉型與危機的時刻推動改變」，出席的學者專家約 240 人，大部分來自於波蘭，論文的場次不算多，但議題卻十分廣泛，既有東歐轉型正義的場次，也有新科技與人權教育、生物科技議題的論文。不過或許是受到教會的影響，女性主義的討論十分地少，多元性別族群（LGBT）的論文付之闕如。

對東吳的團隊來說，印象最深的有下列三件事情。一是與華勒沙（Lech Walesa）見面，華勒沙被邀請擔任開幕典禮的主講人，他在簡短的演說中一再提到他十分討厭議會與官僚體制，不善與之溝通。第二件事情是訪問奧許維茲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Memorial and Museum）。我們在上午出發，時值寒冬，我們從來沒有在這麼寒冷的天氣中生活過，奧許維茲集中營讓我們印象深刻，營地十分遼闊，最叫人不解的是在集中營大門口上的一個標語：勞動使你自由（Work sets one free），在這一句話背後，多少侵犯人權、酷刑、剝奪生命的事情，藉你之名而行！納粹德國的興起以及對猶太人的殘殺是二十世紀的一件大事。為什麼會在德國發生，至今仍然是學者專家爭論的議題。第三件是拜會座落於城中心廣場的波蘭文化中心，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築物中，與奧許維茲集中營形成強烈的對比。該文化中心側重研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文化與社會，也接受外來的訪問學者，如果善於經營，可能成為中東歐的研究中心。

### （二）2013 年台北會議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在決定接辦之後，立即展開籌備工作，在

籌備過程當中，時任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黃秀端教授負責規劃，也積極地向政府及民間社會募款，包括教育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及轄下景美與綠島兩個人權文化園區，在校內又為擔任接待工作的學生進行教育訓練，參與的學生不下數十人，多位校友、系友們與劉吉人先生也都極力幫忙。2013年的會議出乎我們預期，與會的學者專家多達數百人，來自國際的學者專家計有120人之多，尤其東南亞的學者專家為數不少，討論的議題也多采多姿，雖然有不少論文都與亞洲人權狀況以及台灣的轉型正義相關，記憶與遺忘也是我們一個比較特殊的議題，而我們關於多元性別族群的論文多篇十分受到女性學者專家的矚目。會議外的參訪活動則兵分兩路，一是在台北訪問有關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遺址，包括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二是到綠島去參訪。綠島路途比較遠，但做這個選擇的學者專家都留下深刻印象。在綠島的時候並自動發起一項決議，敦促政府盡一步推動轉型正義。他／她們提出的七點訴求如下：

會議決議懇請台灣政府做下列的幾件事情：

1. 台灣政府正式為政治受難者在戒嚴時期所受的迫害公開道歉；
2. 提供來自公眾經費所支撐的各種修復式的服務項目；
3. 對社會大眾提供不受任何限制的關於政治受難者的政府持有的紀錄檔案；
4. 為求推動民主與法治，確切地對學童講解過去侵犯人權的事例；
5. 保證對所有在戒嚴時期侵犯人權的個人究責；
6. 設立一個獨立的真相與正義委員會來記錄政治受難者被迫害的故事，
7. 推廣與加害的和解與究責；
8. 刪除政治受害者的犯罪記錄。

可惜，當時的政府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應。

### (三) 2015年荷蘭 Middelburg 會議

2015年會議在荷蘭舉辦，主辦單位羅斯福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Roosevelt) 的學生僅 600 人，以培養世界公民為志業。這所學校與羅斯福家族關係匪淺，尤其對老羅斯福、小羅斯福以及小羅斯福夫人 (Eleanor Roosevelt) 的理念與貢獻推崇備至。這一次會議以小羅斯福在 1941 年所倡導的「四大自由」為主題，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台灣代表黃秀端教授帶領三位同學同行，分別為來自台灣的張家維同學、香港的葉七輪同學與中國大陸的蔡旭東同學。在這樣不同背景與訓練的基礎上，提出集會遊行是否對民主政治有所幫助的議題，深受會議矚目。會議也安排到海牙和平宮以及國際正義研究所參觀，並在該所舉行研討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黃秀端教授與同學們特意從 Middelburg 到馬斯垂克大學探訪范博文教授 (Theo van Boven)，范博文教授多年擔任荷蘭外交官，參與國際人權事務，也是人權學術界具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多次訪問台灣，既在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開設迷你課程，也在 2013 年參與中華民國首次人權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與過去幾屆年會有所不同，在會議結束以後有一個正式的閉幕典禮，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六位諮詢顧問團的成員發表對這次研討會感想。「諮詢委員會」是在台北會議之後設置的，試圖來協調歷屆承辦過年會的主辦單位，並為其後的年會提供建議。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黃秀端教授也在其列。

## 參、智利的政治發展與轉型正義 (張家維)

### 一、智利的國家概況與歷史簡介

智利位於南美洲西岸，全國總人口數約 1,700 萬人，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國土南北長度約 4,300 公里，為全球最狹長的國家，包含多種型態的氣候與地形；此外，智利也是全球銅礦最豐富的國家。該國首都為聖地牙哥 (Santiago)，人口數約 700 萬人；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智利大學法學院 (Facultad de Derecho, Universidad de Chile)，即位在此地。

位於市中心的小山丘聖露濟亞山 (Cerro Santa Lucía)，現為一座提供民眾與遊客遊憩觀光的公園；爬上階梯登上丘頂的瞭望台，可以俯瞰整個聖地牙哥市區。回望 1541 年，西班牙征服者佩德羅·德·巴爾迪維亞 (Pedro de Valdivia) 甫抵達智利，即在聖露濟亞山舉行聖地牙哥的建城儀式，就此展

開西班牙超過 250 年的殖民時代。直到 1810 年，智利獨立戰爭爆發；1818 年，擊敗西班牙軍隊並就任最高執政官的獨立運動領袖貝爾納多·奧希金斯（Bernardo O' Higgins），始正式宣布獨立並成立智利共和國（República de Chile）。

另外，該國最主要的原住民為隸屬印地安人分支的馬普切人（Mapuche），其農耕生活與紡織文化別具特色；聖地牙哥市區的「莫內達宮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Palacio de La Moneda）與國立歷史博物館（Museo Histórico Nacional），提供常設展覽與歷史資訊，可供參考。在印地安語中，Mapuche 意指「土地的主人」，惟自西班牙人開始殖民後，原住民的土地不僅越來越少，甚至淪為奴隸；即便到了今日，仍有馬普切人因與智利政府之間的土地所有權糾紛，時常發生抗爭與暴力活動。至 1970 年代，國內主要對立不再是殖民利益與獨立自決的歷史遺緒，而是在國際冷戰氛圍之下，左翼文人政府和右翼軍方陣營的激烈對壘。

## 二、軍事政變與人權侵害

座落於聖地牙哥市中心的憲法廣場（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綠意盎然，人行道置有許多長椅供人休憩；廣場北面的莫內達宮（Palacio de La Moneda），是該國總統府的所在地。駐守府前手持步槍的軍人，面對我們詢問總統府開放時間的態度十分和善。很難想像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的不同時空下，同一地點遭到發動政變的軍方空襲；投彈轟炸總統府的影片，在 2010 年對外開放的「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 y los Derechos Humanos）大廳不斷反覆播映，面對著三層樓高、貼滿受難者照片的牆面。決定興建該座博物館的現任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及其父母，也曾是軍事政變後威權統治的受難者。

1970 年代初葉，傾向社會主義陣營的智利前總統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面臨一連串經濟衰退與軍事政變的挑戰。在美國支持下，甫接任陸軍總司令的奧古斯托·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成功發動軍事政變，並展開長達 17 年的威權統治。皮諾契在 1973 年政變成功後，隨即成立秘密警察（Dirección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 DINA），並於 1977 年更名為「智



利國家情報中心」(Central Nacional de Informaciones, CNI)。該組織於皮諾契執政期間，扮演鎮壓和掃除社會黨與共產黨等異議人士的角色，形成系統性且大規模的人權侵害，僅舉二例說明。首先，「死亡特遣隊」事件(Caravana de la Muerte)乃是手段殘忍且最常被提及的案件之一，該特遣隊於1973年皮諾契政變成功後隨即組成，成員包括高級軍官與特務人員；其等搭乘直升機前往全國各地，殺害數百名遭到監禁的政治犯，甚至常在槍決前以大刀切碎受害者的肌肉。第二，在若干南錐國家協議的情報與軍事任務「禿鷹行動」(Operación Condór)中，智利情報組織執行了多個暗殺行動，對象包括前軍事將領、神職人員、外交大臣與美籍記者等。

綜言之，根據2011年智利官方的統計調查結果，皮諾契統治期間死亡或失蹤等人權侵害事由之受害者人數，總計達4萬餘人。該等人權侵害的歷史遺緒與傷痕，不僅成為智利1990年代民主轉型後，歷屆承繼政府處理轉型正義工作的要務，亦是了解該國近代政治發展的核心議題。

### 三、智利的轉型正義工作與可能借鏡

1980年代末葉，皮諾契政府不僅陷入債務危機，亦遭到包括美國在內等西方國家，以及國內反對黨民主聯盟要求民主化的壓力；甚者是，皮諾契亦須面對1988年舉行公民投票後，約有55%民意反對其繼續執政的表決結果。隔年舉行的總統大選，雖由民主聯盟推舉的帕特里西奧·艾爾文(Patricio Aylwin)當選；惟皮諾契政府早在1978年，即制定讓軍方得免於刑事起訴的大赦法，並於1980年修改憲法，明定皮諾契得擔任參謀總長至1998年等有利右派陣營之相關規定。在在可見該國經歷「變革」(transformation)的民主轉型之後，承繼政府仍須面對舊政府、軍方甚至各級法院強烈的威權遺緒；該等因素讓智利轉型正義工作充滿高度的妥協性，亦為多位民選總統採取「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作為處理機制的重要理由之一。

1990年，艾爾文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Comisión Nacional de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調查重點僅包括死亡案件，並於隔年提出以主席勞爾瑞特格(Raúl Rettig)為名的調查報告。2003年，第三任總統李卡多·拉戈斯(Ricardo Lagos)成立「國家政治監禁與凌虐委員會」(Comisión Nacional

Sobre Prisión Política y Tortura），調查重點乃是上開委員會並未涉及、但範圍更為廣泛的任意拘捕與凌虐，亦於隔年即提出以主席賽吉歐·維拉奇（Sergio Valech）為名的調查報告。二個委員會採取對於受害者的補償措施，包括年金、醫療、教育與房屋等優惠措施，並廣泛蒐集、聽取國內外證言作為認定依據；要者是，為避免造成社會的對立與極化，二個委員會均決定加害人名單與被害人證言，在 50 年後始能公開。最後，現任總統巴切萊特於 2010 年第一任期卸任前，又重啟調查前二個委員會遺漏案件的第三個委員會；該委員會亦廣泛聽取證詞，並上修受害者人數，致使該國轉型正義與真相調查工作，愈形完整。

在該國前開的歷史脈絡之下，主辦單位智利大學法學院安排二個相關的參訪地點，說明如下：

### （一）記憶與人權博物館

主辦單位安排與會者參觀二個參訪地點，皆與皮諾契執政時期人權侵害的歷史密切相關，其一即為前述的「記憶與人權博物館」，網址為：[www.museodelamemoria.cl/](http://www.museodelamemoria.cl/)。館藏聚焦在 1973 至 1990 年威權統治的人權侵害紀錄，包括展示政府用以刑求的電擊工具、民間組織活動與宣傳的珍貴史料，以及政府舉行兩次公投的選票等資料。導覽員說明，政府仍未積極將該段歷史納入各級教育的教學內容，因此該博物館乃是少數可供民眾接觸與了解相關資訊的場所。

### （二）和平公園

另一個參訪地點為「格里馬爾迪村和平公園」（Villa Grimaldi），網址為：<http://villagrimaldi.cl/>。該公園原屬私人產業，惟於皮諾契上台後遭政府強制徵收，並作為秘密警察拘禁、拷問與殺害反對派人士的重要據點，其中亦包括巴切萊特及其家人。民主轉型後，所有人原預計將其出售，但遭到鄰近居民因惟恐歷史記憶無法保存而發起反對運動，最後成為國家文物並交由民間成立的基金會運作。園區地處偏遠，符合當年秘密警察選擇此處作為拘禁所，不希望引人注目的條件。園中許多建物早已拆除，但並未計畫重建，原因是不希望藉由重建產生可能對威權政府的緬懷效應。公園中隨處可見期盼人權侵害憾事永

不再犯的意象創作，例如以海洋、葉子為主題的受難者牆面和大門前方地磚圖騰，象徵希望生生不息和記憶的永難磨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智利天主教會於 1976 年成立的牧師會社（La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在皮諾契統治時期協助失蹤民眾的家屬記錄案情、協尋親人和慰撫人心等工作，以及該社成員遭到政府迫害的歷史，讓吾人更深入了解當地的宗教與人權組織，在威權統治期間積極扮演人權保障的要角。

進言之，如同我國為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因而設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景美人權園區一般；提醒政府永不再犯的記憶保存與人權教育空間，對於智利轉型正義工作亦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近年來智利法院雖較民主轉型初期，更願意扮演起訴侵害人權官員的積極角色；惟政府面對公布加害人名單與將歷史納入中小學教材，仍是採取戒慎恐懼的態度。於此，我國歷屆政府轉型正義工作中，除了被認為較富成效的賠償方案以外，尚待加強部分可能包括真相調查與加害人究責。當前，民進黨政府宣示將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於三年內公布調查報告之政策宣示，誠為我國轉型正義工作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對於真相調查結果之開放程度與措施，或可參考智利經驗，進一步思考真相究責與社會和解等因素之間的衡平關係。

智利民主轉型後，至今已歷多次政黨輪替，且長年獲得自由之家評比為穩定且優質的民主表現，值得我國比較觀摩。該國歷屆承繼政府面對不同階段不同強度的威權遺緒，漸進地設立若干真相委員會處理轉型正義的難題，不僅有效率地在短時間完成具有公信力的調查報告，亦廣泛蒐集海內外證言，補強並降低官方史觀的壟斷色彩，相關措施與思維皆值得當前面對相同議題的我國比較參考。

## 肆、智利的高等教育（蔡旭東）

### 一、智利的學生運動

從 2011 年迄今，智利大學生為爭取免費教育發起了多次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最近一次爆發在 2016 年 5 月。7 月，巴切萊政府向國會提交了新的教改方案，計畫從 2016 年開始，幫助 60% 的窮困學生免費上大學；到了 2020

年實現「零學費」，100%的學生都不用再繳學費。智利政府發言人 Marcelo Diaz 表示：「智利的教育體系將由原先市場及利潤導向，逐漸轉型為一個受教權屬於社會權利的體系。」這表明當局終於正面回應了學生對免費教育的訴求。

學生的訴求得到了社會的廣泛同情和聲援。抗議行動不僅表達了學生對高昂學費的憤怒，也表達了智利人民對現行經濟、社會制度的不滿。學生運動所要改變的，實際上不僅是教育體制問題，也是智利的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由軍人獨裁者和他的「芝加哥學派智囊團」（Chicago Boys）所確立，並一致延續至今。這一「模式」確實曾對智利的經濟增長有所裨益，但卻也激化了貧富差距，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智利人民要求當局對教育、醫療、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承擔更多的責任，期盼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

## 二、威權遺緒對教育的負面影響

智利在 2009 年被接納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成員，是南美洲唯一的經合組織成員國。這一身份向來被視為智利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成功標誌。但是在經合組織三十四個成員國中，智利政府在教育支出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佔比是最低的，而智利的基尼系數卻是經合成員國中最高的一個國家之一。

在 1979 年的軍事政變之前，智利已經建立了一套覆蓋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免費教育體系。政變之後，獨裁政權奉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發展模式。1981 年，皮諾契政府取消了國家主導的免費教育，對教育實行了產業化和私有化改革。在許多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討論中，智利的「教育券」制度被認為是戰後最激進、最徹底的市場化改革。

重返民主制度以後，因為種種原因，長期執政的中左政黨聯盟幾乎沒有對這套新自由主義的教育制度進行任何調整。智利人均年收入超過一萬美元，是南美的經濟強國，但是供孩子上大學對於普通家庭來說仍然是相當沈重的經濟負擔。一般的智利家庭，要用收入的六到七成來支付教育開支。相比較而言，美國相關比例是 40%，北歐國家更低於 5%。目前智利的教育經費只有 25% 來自政府，且主要用於資助初等教育。超過六成的大學生就讀私立大學。舉個例

子，醫學一年的學費是六百萬智利比索，約 1 萬 2 千美元，法律和工程類專業稍微便宜些，但一年也要 9000 美元左右。首都聖地牙哥的一家高檔酒店的經理告訴我們，他有三個女兒，都在較好的公立中學念書，但是每月仍要繳納每人 100 美元的左右的學費。這位經理表示，他現在還能負擔得起孩子上學，但是等到她們上大學的時候，他可能就供不起了，孩子們必須自己去貸款。為了上學，智利的大學生們通常都要通過貸款來解決學費問題。大學生們一進入大學大門，就開始欠債，畢業時往往已經積欠了幾萬美金的債務。

### 三、學運將教育問題帶到政治議題的前沿

但沈重的經濟負擔並不是學生們走上街頭的唯一原因。一位智利大學的學生告訴我們，除了高昂的學費，現有的大學入學制度（Prueba de Selección Universitaria）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他認為，教育產業化導致了教育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均。從高中，甚至從小學開始，教育的質量就和學費密切相關，越是好學校，學費就越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沒有錢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學，畢業後就找不到好工作。「這是惡性循環」，他說。根據智利專門促進教育的 NGO 組織「教育 2020」(Educación 2020) 的說法，智利名聲最好的幾家大學裡，有錢的學生佔了壓倒性多數，這幾乎就是一種「教育上的階級隔離」。

在 2013 年的大規模抗議中，時任總統皮涅拉（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曾公佈過一個總體性教育改革計劃，承諾設立總額為 40 億美元的教育基金，增加大學生獎學金，以及幫助無力償貸的大學生借助貸款。但這一改革方案不僅沒有讓學生退回校園，反而令抗議行動更為激烈。學生指出，政府的改革方案只是在細節上打轉，而對他們的主要訴求——重建免費的公立教育——並沒有顯示多少誠意。學生之所以堅持免費教育，乃是因為他們相信，實行「有質量保證、免費的公立教育」是成就一個更融合、更團結和公平的社會的重要基礎。由此可見，智利學生的抗議運動並不是單純的經濟訴求，而是將教育問題帶到政治議題的前沿。

1980 年代晚期，智利反對派為了換取 1988 年公投的順利進行，不得不向軍政府妥協。他們承諾，未來若執政，將願意受 1980 年憲法拘束，而這根本就是一部為獨裁者量身訂做的「憲法」。1980 年憲法規定，若皮諾契卸任總

統，他將繼續擔任智利軍隊總司令。同樣是因為這部憲法的庇護，皮諾契在 1998 年放棄總司令之職後旋即成為享有豁免權的終身參議員。該憲法還規定，參議院中有數名參議員不經民主選舉產生，這些指定參議員大多是前軍隊司令或警察首長。此外，1988 年公投結束後，皮諾契政府又制定了「雙席位制」（Binomial System）的國會選舉制度，以鉗制即將執政的中左政黨聯盟，以利於右翼保守政黨在野後的議會席次和擁有事實上的否決權。

受制於 1980 年憲法的存在，代議制民主的一般機制，比如選舉和立法，都無法解決問題，暗室協商和政治妥協主導了智利的政治過程。在某些方面實現民主化的同時，另一些方面又維持著獨裁時期的制度，這是智利民主進程的重要特徵。有智利學者就指出，政治改革的延宕導致「民主赤字」的積累，政治運行的結果無法及時反映民意。1980 年憲法在根本上對社會整合和民主深化無能為力，相反，它阻塞了民主進程，也就是將民眾的意願轉化為法律和公共政策的過程，這本該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功能。在 1980 年憲法的庇護下，威權的幽靈並沒有隨著當權者逝去而自動消失。

直到 2005 年和 2015 年，智利才通過兩次大幅度修憲清除了上述反民主的制度設計，取消終身參議員與指定參議員，改「雙席位制」為比例代表制，顯著地降低了軍人集團的政治重要性，並將其置於民選政府的監督之下。隨著修憲進程的展開，有關憲法的爭議也開始觸及更為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民生議題，從單純的制度爭論深入到意識形態的核心：智利到底要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2011 年以來頻繁爆發的學生抗議行動，即是過去 30 餘年「民主赤字」的惡果，也是近十年憲法爭議深入的表現。現任智利學生聯盟的發言人薩瓦德（Valentina Saavedra）就說：這個民主並不是我們應得的民主。

有學者指出，智利在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已經明顯落後於社會的進步。遲至 1999 年，同性性行為在智利才得以除罪，是最晚的拉丁國家之一；到 2004 年才有了有關離婚的法律，此前離婚只能靠詭計；2012 的反歧視法對性別和種族平等提供了支持；而墮胎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 四、不明朗的改革前景

巴切萊特執政以來，基本上兌現了她在競選時的承諾，先後出台並開始實

施稅收、教育、選舉制度等項重大改革。但巴切萊特的執政聯盟由 7 個政黨組成，其中有左翼政黨，如社會黨、共產黨，也有中間政黨，如基督教民主黨，各黨意見分歧在所難免。再加上在野的右翼反對黨對巴切萊特的牽制就更多，因此，巴切萊特在尋求憲法改革方案時需要進行更多的政治妥協，以平衡各黨派之間的不同利益。就教育改革而言，巴切萊政府雖然規劃了「免費教育」的願景，但仍提出免費高等教育需與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成長率進行配套，而不是立刻實施。據智利 Cadem 民調，約 62% 的受訪民眾對於本項教育改革持保留態度，蓋因智利目前的經濟成長趨緩甚至衰退，令免費教育遙遙無期。

## 伍、後威權時代智利文化與藝術（朱家瑛）

### 一、向經歷的事物學習

壓迫和反抗的戰鬥，比的除了是何者力量較恆久外，也在於何者較有創造性，文學和藝術在抵抗壓迫的戰鬥中從來不曾缺席。智利素有豐富的文學藝術傳統，在極權統治期間，智利女性更曾以舞蹈 *Cueca* 對抗暴政。隨著時間的推移，威權記憶仿若遠去，如何由文化的角度，銘記歷史，向過去學習，確保不再重蹈覆轍，智利的經驗值得臺灣做為借鏡和學習，尤其當從極權過渡到民主，政權和平轉移的歷史，在臺灣看來格外相似。

智利物產豐饒，蔬果、美酒、海鮮和礦產出口世界各地。作為世界的糧倉，智利文化長在豐沃土壤上卻幾經風霜。1970 年代阿葉德社會主義政權引來美國尼克森政府的政治干預，所資助的皮諾契軍政府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以武力政變方式接掌智利，開啟 1973-1990 年長達 17 年的極權統治時期。政變後，軍政府大肆追捕政治異議人士，於散布智利全國各地的集中營秘密進行取供，如同多數極權統治下的一貫迫害手法，酷刑、監牢、失蹤、流亡、處決。根據智利人權與記憶博物館估計，光是 1973 年 9 月，就有 598 人死亡，274 人受拘禁、失蹤，且有 19,083 人成為政治犯並遭酷刑對待。時至今日，官方統計死難人數共有 3,000 餘名。1990 年皮諾契軍政府在公投失敗後黯然下台，離開權力舞台，繼任民選總統接手，政權和平轉移。2010 年紀念此段歷史的智利人權與記憶博物館開幕，時任總統 Michelle Bachelet 在博物館入口碑牌寫下：「我們無法改變過去，僅能向經歷的事物學習，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

挑戰」。

本文首要介紹皮諾契軍政府極權統治期間，智利女性如何以國舞「Cueca」作為抗議威權的手段，再藉由幾個智利當代文化展演片段—GAM 藝術中心及舞蹈劇「頑固之夜」（La Noche Obstinada）、聶魯達故居博物館及其管理基金會—從舞蹈及文學角度，檢視後威權時代當代藝術如何與智利大眾對話。這既是為了抵抗遺忘、銘記威權的陰影，更是呼喚近在眼前的另一種壓迫不再重演歷史覆轍。最後，則以一小篇幅介紹智利原住民 Mapuche 與當代政府的傳統領域之爭作為結尾。一個曾被西班牙長期殖民，後又剛剛結束獨裁政權經歷的國家，在處理境內原住民自治權上是否將重蹈壓迫之路，可作為智利人是否能如總統 Michelle Bachelet 所言「從經歷的事物學習」之檢驗。

## 二、單人之舞 La Cueca Sola

在介紹智利當代文化如何抵抗威權歷史記憶之前，必須由威權時代的藝術抵抗—單人 Cueca 談起。Cueca 作為舞蹈和音樂的結合，流傳在中南美洲多個國家，其源起眾說紛紜，最遠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代，其舞蹈形式採雙人舞，舞者雙手持手帕，身穿亮麗的傳統服飾，透過踏步、側身、轉圈及揮舞手帕，隨熱鬧的音樂交流互動。

Cueca 在智利有其悠遠的歷史傳統，諷刺的是，被指定為智利國舞之時，正是皮諾契軍政府統治的 1979 年，隨著軍政府大肆逮捕異己，遭到拘禁、失蹤者多半是男性，原先的雙人舞，共舞者也許是某人的父親、兄弟、兒子、丈夫，如今僅剩孤單形影。

單人 Cueca 的抗議形式首見於 1978 年，在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上，政治受難者家屬團體（la Agrupación de Familiares de Detenidos Desaparecidos，簡稱 AFDD）組成的樂團，發表了由 Gala Torres 創作的「La Cueca Sola」（譯意：單人 Cueca），其中歌詞寫道：

En un tiempo fui dichosa 過去快樂時光  
apacibles eran mis días 我們的日子是平靜的  
mas llegó la desventura 當不幸降臨  
perdí lo que más quería 我失去了最渴望的



女性舞者在胸口貼著失蹤家人的照片，以此取代共舞者的位子，揮著手帕，支身獨舞，這些女性成為了「無人可共舞的獨舞者」，此舉意在抗議獨裁暴政，也是追悼親人，不需要更多言語，即可領會其中的悲傷。此後，單人 Cueca 成為 AFDD 成員譴責暴政的傳統形式，時至今日，Cueca 仍持續被傳頌、傳跳，紀念軍政府時代政治受難者的街頭場合，也能見抗議者手持手帕，以單人 Cueca 銘記親人，持續呼求真相與正義。

英國流行歌手 Sting 曾以此為題材，在 1987 年創作了歌曲 *They Dance Alone*，歌詞：

Why are there women here dancing on their own? 為何這些女性在此獨舞？

Why is there this sadness in their eyes? 為何他們眼中有著傷悲

They' re dancing with the missing 她們與失蹤者共舞

They' re dancing with the dead 她們與亡者共舞

Sting 並在 1990 年國際特赦組織於智利國家體育場舉辦的演唱會中，與數十名舉著受難者頭像相片的政治受難家屬團體共同上臺表演。值得一提的是，智利國家體育場在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也曾是一重要的政治犯拘禁審訊地點。

### 三、GAM 與 Spandex 派對

首都聖地牙哥城內有幾座重要的藝術文化場館，其中 GAM 藝術中心即是以詩人 Gabriela Mistral 為名。Gabriela Mistral 誕生於智利中北部小城，相當年輕即展露寫作天賦，終身致力於文學、民主運動及教育；1922 年曾獲墨西哥政府邀請至當地參與教育改革，也在 1932 年在智利政府開展外交事業，足跡遍及巴西、西班牙、葡萄牙及美國。

佔地龐大，外觀現代新穎的 GAM 於 2010 年開幕至今，以「藝術、文化和人」為號召。作為藝術與音樂中心，致力於推廣古典及現代流行音樂、當代戲劇與舞蹈等表演。這座藝術中心建立於 1972 年，曾作為阿葉德政權時期舉辦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場地。GAM 在當時即為人文及藝術匯聚地，皮諾契軍政府期遭關閉轉作其它政治用途直到 1989 年，後又為其他機關挪作他用，直到 2006 年慘遭祝融之災造成部分建築體毀損後，總統

Michelle Bachelet（亦為 2016 年現任總統）重新修復啟用。除了室內展覽及戲劇表演外，GAM 的挑高中庭及周邊場地也是各項戶外聚會活動的場所。造訪期間，曾見聞青少年在此練習舞蹈，也見當地犬隻飼養社群聚會，動物保護團體於此擺攤販售寫有「認養代替購買」字樣的手提袋及各項寵物用品。

此時在 GAM 上演的是阿根廷籍劇作家 Pablo Rotemberg，2014 年作品 *La Noche Obstinada*（譯意：頑固之夜）。劇作中以 90 年代聖地牙哥風靡一時的「Las Fiestas Spandex」（譯意：Spandex 狂歡派對）為背景，由 7 位近幾赤裸的舞者，結合流行音樂，大量使用身體、性與暴力等元素，意在由南美洲軍事獨裁政府的文本脈絡中，解放過去受暴力主宰的身體。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的聖地牙哥，軍政府獨裁政權的尾聲，智利的民主夢忽隱忽現，極具反叛挑釁意味的「Spandex 狂歡派對」在地下文化之中大行其道。由 Daniel Palman 所創立的 Spandex 派對不只是舞會，更是身體和裝扮風格展現，也是智利的 90 年代青春時期，融合龐克及多種當代流行風格，揭示了動盪時代下非主流文化的轉型。

本劇 2014 年上演時大受好評，2016 年重新回到 GAM 演出時亦是全場滿座。劇中以大量的身體碰撞，描繪軍事極權政府統治下，隱藏於各個環節的規訓與壓迫。近年來「Spandex 狂歡派對」又有重回聖地牙哥夜生活的趨勢，究竟只是懷舊風潮，或是應證了宣傳台詞所說：「Spandex 狂歡派對，於智利民主半夢半醒之時誕生，並於智利民主成為虛假理念時重返舞台！」

#### 四、La Chascona 與聶魯達基金會

智利的另一項傳統是文學。談起拉丁美洲文學，著有《百年孤寂》的哥倫比亞籍小說家馬奎斯最為臺灣人所熟知。然而若以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成績作為衡量指標，智利的得獎次數至今仍是中南美洲之冠，可稱作是「文學獎之家」— Gabriela Mistral（1889—1957，1945 年獲獎）及聶魯達 Pablo Neruda（1904—1973，1971 年獲獎）。Gabriela Mistral 在臺灣知名度不若 Pablo Neruda，卻是中南美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也是至今中南美洲唯一一位女性獲獎者。Pablo Neruda 因有作家陳黎、張芬齡等人譯介，又以詩句「愛情太短，遺忘太長」聞名，二位的生平都與政治、教育和人道息息相關，其影響力也都

透過藝術的其他形式獲得保存，在智利當代文化社會中，發揮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聶魯達故居博物館 La Chascona 位於聖地牙哥著名的觀光地區 Bellavista，距離智利大學法學院校區徒步二分鐘路程，深受觀光客喜愛的特色餐館沿著人行道林立，夜間則搖身一變成為酒吧。La Chascona 位居高地，可俯視鬧區，房屋建築由聶魯達於 1953 年起參與規畫設計，其西班牙語原意為「亂髮」，作為情人 Matilde Urrutia 的暱稱，此屋也是為 Matilde Urrutia 而建，聶魯達直到 1955 年與第二任妻子 Delia del Carril 分手後正式搬入此屋。

1973 年 9 月 11 日，皮諾契發動軍事政變，聶魯達多數的朋友均淪為階下囚，或是流亡他國尋求庇護，得知消息時聶魯達正在距離首都數小時車程的城市 Isla Negra，後因健康因素回到聖地牙哥。歷史記載聶魯達於政變數日後即死於疾病，然而隨著近期史料挖掘，又有一說認為一生跨足政界與文壇的他，因為政治理念與軍政府相左而死於謀殺。聶魯達死後，La Chascona 遭軍政府支持者大肆破壞，然而在 Matilde Urrutia 堅持下，聶魯達的喪禮仍在家中舉行。出殯當天，儘管在獨裁統治的禁錮下，仍有許多擁戴者前往夾道追念，Matilde Urrutia 則在修復 La Chascona 後，長居於此直到 1985 年過世。

如今 La Chascona 成為一座博物館展示各項藝術品蒐藏及生前遺物，由聶魯達基金會（Fundación Pablo Neruda）管理，除了管理聶魯達生前故居改建的博物館，展示各項生前遺物及藝術品蒐藏外，聶魯達基金會也致力於培育智利在地的年輕藝術及文學創作者，博物館經常性辦理各項文藝活動、文學獎項及工作坊，建立寫作者、藝術家及學術研究者交流活動，促進智利文化領域多元發展。2016 年 11 月底，聶魯達基金會將最新一期的青年詩人聶魯達獎章頒贈給出生於智利，具有德國文化背景的 Gloria Dünkler（1977—），盛讚其作品融合智利南部的德裔文化及原住民 Mapuche 的語言、文化及政治，其書寫涵蓋複雜的土地認同及國族歷史記憶。

## 五、原住民傳統領域之爭

前所提聶魯達基金會將注意力放到智利文化與原住民文化融合並非偶爾，智利與原住民關係仍是未解的難題，其中尤其以傳統領域的劃分認定議題為當

前最大衝突點。

智利人自嘲身處世界盡頭，然而世界卻不曾忽略智利。西班牙殖民為智利帶來語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變革，時至今日首都街頭仍可見滿街的殖民時期建築。其中，座落於智利市中心的「前哥倫布時期藝術博物館」（Museo Chileno de Arte Precolombino）於 1981 年開幕，館內收藏超過 5000 件哥倫布時期美洲藝術品，以及一系列原住民 Mapuche 及 Aymara 文物，標誌著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藝術文化成就得到肯認，但在原住民與國家關係上仍是困難重重。

Mapuche（音譯：馬普切）是智利最大的原住民族群，最早散居於智利南方，範圍廣泛，橫跨安地斯山脈至海岸沿線，西班牙殖民前估計約有一百萬人口，如今約有 60 萬（智利總人口數約 1800 萬人），多數 Mapuche 人居住於智利南部 Araucanía 地區的城市、首都聖地牙哥或是南部 Los Lagos 及 Bío Bío 地區。

Mapuche 與智利政府的衝突主要源於 19 世紀，當時智利政府軍隊攻克自治區，原有傳統領域土地私有化，造成族群瓦解，族人移居都市，1970 年代為止，幾乎約有 70% 的 Mapuche 人移居都市，多數處於極度貧困情況下。在軍事獨裁期間，政府再度強制將原住民傳統領域私有化並執行人口同化政策，力圖將原住民融入主流社會中；當每個人都是智利人，即不再具有特殊文化保存政策之需要，大幅減少原住民族群。直到智利再度民主化，新法案認可並致力於推動保存智利原住民族群。1995 年又因為水力發電廠建造案，以及 1997 年原住民和林木業者的衝突，傳統領域自治權的爭議再度端上檯面，至今每逢紀念殖民者抵達美洲的哥倫布日（Columbus Day），Mapuche 人均會發動遊行抗議活動，要求歸還遭私人 and 林木業者強占的傳統領域及釋放因抗議遭逮捕的 Mapuche 政治犯，抗議活動往往由和平轉而引發暴力衝突，最後出動鎮暴水槍及催淚瓦斯，登上國際版面。

Mapuche 人在對抗的手段中，也曾被控以縱火、破壞、暴力威嚇等方式強制私人土地持有者出讓土地，引發是否成為恐怖主義者的爭論。然而問題終需回歸到國家層級面對，如前所言，一個曾被西班牙長期殖民，後又剛剛結束獨

裁政權經歷的國家，在處理境內原住民自治權上，是否能從過去歷史中銘記錯誤，仍有待後續長期觀察。

# A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onference in Chile

Mab Huang

Joseph K. Twanmoh Chair Professor,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June Liu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Chia-wei Chang

MS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Xu-dong Cai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Chia-jong Chu

MS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 Abstract

This is a brief report on the 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onference in Chile. The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and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le in Santiago from December 12 to 15 2016. Five of u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either presented a paper or shared their research work via posters. Howev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port, w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we should separately write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our observations in Chil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structure, Ms. June Liu introduce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is series of conference, Mr. Chang Chia-wei report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hile, Mr. Cai Xu-dong on Chile's higher education, Ms. Chu Chia-jong on Chile's art and culture in her post authoritarian era, and my report emphasizes the activities and networking taken place in the conference.

## Keywords

Chile, human rights education

---